

聂作平

深秋，古道两旁的梅树掉光了叶子，细细的枝条在风中晃动，既像坚硬的铁丝，又像章法凌乱的草书。

乱石铺就的古道岁月久远，来往的人马将它踩出了幽暗的光泽。顺着古道行走半小时后，我看到路旁有一株高大的松树。树下，有一块石碑，红字书写：东坡树。

相传，这棵树已有近千年历史。当年，苏东坡亲手种下了它。当苏东坡早已从喧嚣人间撤退，如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，他种的树也留了下来。

这条遍植梅树的古道，地处著名的梅岭——南岭之一的大庾岭的组成部分。1100年正月，25岁的宋哲宗去世，其弟赵佶继位，是为宋徽宗。五月，苏东坡结束了流放生涯，自海南北归。

次年正月，苏东坡翻越大庾岭，在**梅岭古道**的一座小村庄休息时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问他的随从：这个官人是谁？随从说：苏尚书。老者又问：是苏子瞻吗？随从称是。老人激动地上前作揖，对苏东坡说，我听说你遭遇了很多迫害，今天能够平安北归，这是天佑善人啊。苏东坡笑而致谢，并在墙上题诗一首：

鹤骨霜髭心已灰，青松合抱手亲栽。
问翁大庾岭头住，曾见南迁几人回？

试问青天路短长

对苏东坡来说，1093年的秋天的确是一个多事之秋。这个万木摇落的凄怆季节，他的命运再一次发生逆转，这两个被林语堂称为苏东坡的守护神的女人之死密切相关。

八月初一，苏东坡之妻王闰之去世，享年46岁。王闰之是苏东坡的第二任也是最后一任妻子。回想起这个与自己相伴了25年的女人，苏东坡凄然命笔，在祭文中说：奈何泪尽目干，旅殡国门。我实少恩，惟有同穴。王闰之的遗体暂厝于开封城西的惠济院。此后，由于苏东坡贬居岭南，一直没能入土为安。要等到十年后，苏东坡也魂归道山，才由苏子由将她与苏东坡一起安葬。

九月初三，一直欣赏并重用苏东坡的太皇太后高氏驾崩，哲宗亲政。很快，苏东坡就外放定州。如果说高太后去世，让苏东坡意识到从此少了一株可以依靠的大树的话，那么，当他向名义上是他学生的哲宗辞行，哲宗却避而不见时，他更加明白：曾经如锦绣绣的仕途，以后，必将布满荆棘。

一生中，苏东坡一直相信，他那坎坷曲折的人生，其实早就由上天注定——那就是他的星座不好。

用星座占卜起源于古巴比伦，隋朝时经印度传入中国。到苏东坡时代，已成为一种广为流传的时尚，占五星就是其中一种。苏东坡的生日，查万年历可知，是为公元1037年1月8日，属摩羯座。

就像我们今天特别爱“黑”处女座一样，唐朝和宋朝人特别爱“黑”摩羯座。唐代诗人韩愈就属摩羯座，他感叹说，“我生之辰，月宿南斗，牛奋其角，箕张其尾。牛不见服箱，不把酒壶。箕独有神灵，无时停簸扬。”（“我出生之时，恰值月在斗宿，牵牛星耸动双角，箕星张开大口。不见牵牛星拉豪车，不见斗宿装美酒，唯有箕宿独显神灵，致使我一劳若苦。”）

苏东坡对十二星座颇有研究，他自认和韩愈一样，因星座不佳而命运坎坷。他感慨说，我与韩愈都是摩羯座，同病相怜，命格不好，注定一生多灾多难。

不仅星座让苏东坡把自己和韩愈牵扯到一起，太行山也让苏东坡联想到韩愈。当他从开封前往定州履新时，途经太行山东麓。对这座纵贯华北平原的名山，苏东坡自然想一睹芳容。然而，风沙太大，太行山若隐若现，未能如愿。当朝廷免去他的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，罢定州任，以朝奉郎身份知英州时，虽然这无疑是断崖式的降级和不折不扣的贬谪（端明殿学士为正三品，朝奉郎为正六品），但他还是抱着比较乐观的心态。因为，从定州南下，再次经过太行山时，天气由阴转晴，他看到了官道西侧逶迤而过的大山，就连山上的草木也历历可数。

这让苏东坡想起韩愈。韩愈曾被贬潮州，自潮州北返时，途经衡山，衡山也由阴转晴，苏东坡由是想到，或许，他也将像韩愈贬潮州那样，很快就会结束贬谪重归中原。

然而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苏东坡过于乐观。他没能像韩愈那样在潮州只居住半年，**他将在偏远的岭南，度过艰难而又漫长的六年多**，差不多相当于他生命的十分之一。

1094年闰四月，苏东坡由定州前往岭南，其路线是从定州陆路南下，经临城、内丘、相州（今河南安阳）、滑州（今河南滑县）至陈留（今开封陈留镇）。陈留距京师开封只有几十里，意外的是，苏东坡没有进京。或许，京城纷繁复杂的人事已令他厌倦、畏惧。

才从定州出发，御史虞策认为对苏东坡“罪罚未当”，于是第二道诏命下达，苏东坡由正六品降为正七品，以左承议郎的身份知英州。过了几天，御史刘拯又向哲宗进言，说“轼于先帝，不臣甚矣”，于是第三道诏命下达，苏东坡仍担任英州知州，但永远不得提拔。

在陈留，本应东南行的苏东坡折向西南，绕道400多里，前往汝州。到汝州，是为了看望上月才从京师调任汝州知州的弟弟苏子由。苏东坡曾经感叹他没有更多的兄弟，“四海一子由”，苏子由既是他的骨肉兄弟，也是他的精神知交。一生中，苏子由给了苏东坡巨大而又无私的帮助，既有道义上的理解和支持，也有物质上的帮衬与扶助。苏东坡陷乌台诗案时，苏子由真诚地向朝廷提出，希望用自己的官职换来对哥哥的从轻处理。这一次，苏子由又拿出一笔钱给苏东坡，苏东坡这才有能力叫长子苏迈带着家人到宜兴居住，他自己前往岭南。苏东坡在给参寥和尚的信中说：“子由分俸七千，远将家大母，就食宜兴。既不失所，外何复挂心，萧然此行也。”

与弟弟小聚后，苏东坡复又踏上征途。他向东北而行，抵达开封附近的雍丘（今杞县）。之后，艰辛的陆路，将由相对较为舒适的水路替代——淮河的二级支流惠济河自开封而来，流经雍丘。苏东坡买舟东去，自惠济河而入涡河，自涡河而入淮河，自淮河而入大运河，自大运河而入长江。水路虽然绕行不少，毕竟人在舟中，既不必辛苦骑马，

说人解史

春梦无痕

苏东坡的人生地理（下）

►北京故宫博物院“苏轼主题书画展”上的“东坡先生懿迹图”局部。此图为明代李宗谟所作，绘制了苏轼的十三则逸事，表现了苏轼生平中的部分重要事件。本报记者李牧鸣摄

更不用走路，且有夹岸风光可赏。从苏东坡留下的诗作可以看出，当舟至淮河下游时，随着两岸风光的愈发明丽，他的心情渐渐变得开朗起来。他坐在船上，看到淮水幽深，鱼影成串；浅滩上，菖蒲簇拥，水草如龙；两岸林木茂密，临水的合欢开花了，红色的花朵毛茸茸的，甚是可爱。

苏东坡经高邮、扬州后进入长江，溯流而上，于六月初七抵达江宁（今南京）。

王安石遭排挤后，曾贬官江宁，后辞官隐于江宁城外半山园。年轻时，苏东坡受乃父影响，加上个人见解不同，对王安石及其新法颇有讥讽。但是，随着年齿渐长，阅历日丰，他慢慢理解了王安石——至少，哪怕他不同意新法，也对王安石的人格与才学，保持着一份敬意。1084年，苏东坡结束黄州贬谪时，**舟次江宁，专程拜访已悠游林泉的王安石**，两人推心置腹，流连忘返，苏东坡写诗感叹“从公已觉十年迟”。然而，光阴倏忽，匆匆十载。这时，王安石已去世八年了，墓木已拱。被风困在江宁城外的苏东坡，没法再去拜访那个誉满天下旁满天下的倔强老人了。

20多天后，苏东坡到达当涂。这时，又一道诏命从京师传来，这也是对苏东坡的最终处分：下落左承议郎，责授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惠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。也就是说，取消了他承议郎的正七品级别，名义上是宁远军节度副使，但并不到宁远军就任，而是安置惠州——如同当年贬黄州团练副使一样，名义上还有职务，事实上既无权也无薪，乃是被监管的犯官。

命运就像在玩玩笑，它让苏东坡在结束黄州贬谪后数年里，一路高升，成为举足轻重的朝廷重臣，复又让他从高处猛然跌下，重回十多年前的起点。

苏东坡只能接受这一切不公的安排。之前，他已令长子苏迈到宜兴居住；此时，又令次子苏迨也前往宜兴。至于他，他让幼子苏过和侍妾朝云，以及两个老婢跟随，继续前往岭南。

溯江而上，到达鄱阳湖与长江交接的湖口后，苏东坡的船折而南下，越鄱阳湖，进赣江，溯赣江而上，经南昌、丰城而达庐陵（今江西吉安）。庐陵是欧阳修的老家，欧阳修不仅对苏东坡有过遇之恩，后来还是亲戚——欧阳修的孙女嫁给了苏东坡的次子苏迨。如同王安石一样，此时欧阳修也死去多年。尽管年龄比欧阳修和王安石小得多，但曾经有过交游的老友们——离世，未免不让苏东坡心中升起一阵淡淡的忧伤。

赣江由南向北，纵贯江西。在赣南的万安境内，一道大坝横立于峡谷之间，高峡出平湖，形成了碧波荡漾的湖泊，称为万安水库。大坝矗立之前，这里曾是千里赣江上最险要的路段，18个险滩一个接一个，成为旅行者的畏途。**其中一座滩，它的名字广为人知：惶恐滩。**

比苏东坡晚近200年的文天祥被俘北上时曾对惶恐滩记忆犹新：惶恐滩头说惶恐，零丁洋里叹零丁。至于苏东坡，当他小小的客船在纤夫们的拉动力下逆流而上时，接连不断的险滩，尤其是这座名为惶恐滩的险滩，都让他生出了行路难、人生更难的感慨。他体悟了命运的无常与行走的艰辛：七千里外二毛人，十八滩头一叶身。山忆喜欢劳远梦，地名惶恐泣孤臣。

《读史方輿记要》在赣水条下称，十八滩“怪石如精铁，突兀廉厉，错峙波面。”不过，随着上世纪末万安水库竣工蓄水，十八滩均没入水中，昔年令苏东坡、文天祥无限惶恐的惶恐滩不复存在。

赣州是江西南部重镇，章水和贡水在宋代城墙下交汇，始称赣江。站在赣州最知名的郁孤台上遥望，江水浩浩北上，不舍昼夜。在**苏东坡时代，赣州名为虔州**。今天的赣州市区，有一座草木葱茏的天竺山，也是赣州烈士陵园所在地。900多年前，当苏东坡系舟虔州，登临郁孤台后，又去了天竺山。

苏东坡一直记得，12岁时，父亲苏洵从虔州归家，告诉他，虔州城外天竺山中，有一座天竺寺。寺里，有一块石碑，上面有白居易亲笔书写的诗句“一山门作两山门，两寺原从一寺分”。如今，他终于寻访到了父亲的旧游之地——其间是四十七载漫漫岁月。当初那个聪慧的少年，已入垂垂老境。令苏东坡失望的是，父亲说过的那块碑，上面的诗句看不清了，历尽沧桑的石碑，独对斜阳草树。苏东坡慨叹，四十七年真一梦，天涯流落泪横斜。——当一个垂老之人怀念早已亡故的父亲时，他一定像父亲那样，过多地领略了人世的冷暖凉凉。

赣州之后，苏东坡的船进入狭窄的章水，继续溯江而上。当他来到距赣州200多里的大余时，必须舍舟登岸。因为，他将翻越横亘于江西、湖南、广东之间的南岭——准确地说是，南岭中最东边的大庾岭。

梅岭是大庾岭诸峰中的一座，北为大余，南为南雄。一条叫海关的古道斗折蛇行，穿越林莽，将岭南与中原联结在一起。苏东坡就顺着梅岭，一步步从中原来到岭南。

在南岭南麓的南雄，他再次登船——这条发源于南岭的河流，名为浈江，是珠江支流北江的上游段。他经韶州（今广东韶关）而至英州（今广东英德）——如果按朝廷最初的任命，他将是这座城市的最高官，虽然边远，毕竟好于惠州；更重要的是，身份也不同于现在。

由浈江入珠江，顺流而下，到广州后，苏东坡小事停留，又溯东江而上。十月初二，苏东坡终于**到达目的地惠州**。此时，距他从定州出发，已经过去了六个月。

说人解史

苏东坡的人生地理（下）

►北京故宫博物院“苏轼主题书画展”上的“东坡先生懿迹图”局部。此图为明代李宗谟所作，绘制了苏轼的十三则逸事，表现了苏轼生平中的部分重要事件。本报记者李牧鸣摄

苏东坡时代的惠州，是一座偏僻落后的岭南小城。如今，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宜居之城。西枝江在市区汇入东江，两条河形成了一个巨大的Y形，今天的惠州城被两条江分割为三部分，而纵横江上的桥梁又将它们紧密地联为一体。

如同苏东坡曾驻留过的其他城市一样，惠州人也以苏东坡为傲。在今天的惠州，和苏东坡有关的景点、建筑或遗迹比比皆是，其中，名头最响亮的，莫过于西湖。惠州西湖由几片相通的水域组成，原名丰湖。苏东坡第一个把它叫作西湖，一则它位于城市西边；二则，碧波荡漾的丰湖让他想起杭州西湖——理所当然地，我以为，他同样还想起了在杭州西湖度过的那些优雅浪漫的诗酒岁月。从那以后，人们就把丰湖改名西湖，直到今天。

很显然，西湖是苏东坡谪居惠州时日常的游玩之地。“一更山吐月，玉塔卧微澜”，他的诗句透露出他曾在月夜漫步。今天，六如亭、景贤祠、东坡纪念馆等景点都次第分布于湖畔。

不过，我更感兴趣并着意寻访的，不是西湖，而是苏东坡在惠州居住过的三个地方。

1094年十月初二到达惠州后，苏东坡居住于合江楼。今天的惠州城里，西枝江注入东江的地方，有一座东新桥。桥头，赫然耸立着一座高达九层的塔楼，这就是合江楼。然而，如此崭新气派的建筑，显然出自现代人手笔。苏东坡时代的合江楼，是皇华馆内临江的一栋房子。皇华馆，相当于政府招待所。

按规定，像苏东坡这种被管制的犯官，没有资格住皇华馆。因此，16天后，迫于时议，苏东坡不得不搬出合江楼。

苏东坡住进了一座寺庙，即嘉祐寺。在西枝江南岸，一座重檐翘角的庙宇，掩映于火红的木棉花和常绿的小叶榕荫里。这就是嘉祐寺。不过，它并非苏东坡时代的嘉祐寺。苏东坡居住过的嘉祐寺在西枝江北岸的东坡小学校园内。

东坡小学被周边高高低低的民居包围、遮蔽，哪怕大门，也因在一条小巷深处而显得很有几分局促。透过围墙，能看到操场上立着一尊手持书卷的苏东坡塑像。学校不对外开放，我无法走进校园。当地的有关资料说，嘉祐寺旧址就在校园里，不过，仅余一间偏房——而且，也不可能是苏东坡时代的遗像。

苏东坡在嘉祐寺住了五个多月，又一次搬回了“政府招待所”合江楼。他为什么去而复来呢？

这得从苏家的一门早就就不走动的亲戚说起。

苏东坡有一个姐姐，小名八娘，16岁时嫁给表兄程正辅为妻（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是程正辅的姑姑）。虽是亲上加亲，公婆却长期虐待她。次年，八娘产下身患重病，程家不为她医治，苏洵只得将她从程家接回。然而，当八娘的病稍有好转，程家却又上门指责她不受妇道，并将婴儿抢走。八娘愤慨交加，几天后即去世，年仅18岁。

苏洵对爱女之死大为悲愤，宣布与程家断绝一切来往。从此，两家几十年都不通音问。苏东坡刚到惠州，他的前姐夫程正辅被任命为广东提刑，即提点刑狱司长官。在宋代，这一职务的职掌是负责一路（约相当于一省）的司法、纪检和财政监督。

程正辅被派往广东，正是有人知道程家与苏家几十年不和，想利用这种不和，给苏东坡制造麻烦。

这个如此有心机的人，就是苏东坡年轻时的好友章惇。

章惇早年与苏东坡过从甚密，是无话不谈的知交。苏东坡在凤翔任判官时，时任商洛县令的章惇曾来拜访，两人在山中游玩，一根独木桥通向对面的绝壁，桥下是万丈深渊。章惇提出两人从独木桥上走过去，在绝壁上留下墨迹。苏东坡连称不敢。章惇却轻易地走过独木桥，在苏东坡胆战心惊的注视下，从从容容地在绝壁上写下六个字：章惇苏轼来游。

等章惇写毕再回来，苏东坡不由抚着他的背感叹：尔日后能杀人，章惇问其故，苏东坡回答说：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。

后来，随着时局发展，两人政见不合，越走越远，友谊的小船早就打翻在风浪中，他们从无话不谈的朋友蜕变为势不两立的敌人——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，朋友一旦变成敌人，他整起你来会更加残酷也更加顺手。

哲宗亲政后，章惇起用为相，对苏东坡的一贬再贬，他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不过，即便把苏东坡作为犯官监管在惠州，他犹感未能解恨，便将与苏家有隙的程正辅调到广东，以便与苏东坡为难。

苏东坡得知前姐夫天掌广东刑狱后，摸不清他将怎样对待自己。在朋友提醒下，他给程正辅写了一封情辞诚恳的信，信中感叹：“昔人以三十年为一世，今吾老兄弟不相从四十二年矣，念此，令人凄断。”程正辅为苏东坡的信所感动，并且，他早就有和苏家修好的想法，于是热情回信。不久，他来到惠州，与苏东坡“相得甚欢，前却尽释”。不仅章惇借刀杀人的阴谋落空，而且苏东坡很快又搬回了“临大江，极轩敞”的合江楼。

苏东坡在合江楼又住了一年多，再次搬家——他原以为，贬谪生涯将像韩愈那样很快结束，孰料小人作祟，归期遥遥难觅。他只好在距嘉祐寺不远的一座名为白鹤山的小山下买了一片地，盖起了房子。堂成后，他写信给朋友，希望能为自己提供一些果树苗——树苗不能太大，大了不易成活；也不能太小，太小的话，自己年岁已高，怕



等不到挂果了。

非常幸运，就像在黄州遇到了徐君猷这个“相得如骨肉”的地方长官一样，在惠州，苏东坡则遇到了知州詹范。对名闻宇内的大师，詹范十分亲近，不仅让他住进合江楼，还不时邀请苏东坡来喝酒。到了后来，由于关系密切，两人有时就着一碟用槐叶做的凉菜，就可以兴高采烈地消磨大半天。

西湖既是苏东坡的闲游之地，也是他的垂钓之处。他一个人提着鱼竿到湖边钓鱼。可能垂钓手艺太一般，很多时候一无所获，但他仍乐呵呵地乐此不疲。有一天，他在湖中钓到一条很大的鲢鱼，高兴高采烈地提着鱼，跑到詹范家里和詹共同分享。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，于苏东坡是一种极大的安慰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：“到惠州将半年，风土食物不恶，吏民相待甚厚。”

与物产丰饶的中原相比，惠州的生活条件差得多。黄州有上好的猪肉，价格便宜。惠州城小，很少有猪肉卖。唯一的一座市场，每天只杀一头羊，僧多粥少，要吃上羊肉不是一件容易事。不想，**这种艰难条件，竟迫使美食家苏东坡发明了烤羊脊。**

全惠州每天只杀一头羊，苏东坡说他“不敢与在官者争买”，于是叮嘱屠户，把羊的脊梁骨卖给他。苏东坡把羊骨煮熟后，用热酒淋一下，再蘸上盐巴，放到火上烧烤，烤熟后就用竹签慢慢地挑着吃。羊骨的肉很少，因此终日挑剔，好像吃螃蟹。

苏东坡给苏子由写信，详细地介绍了烤羊脊的制作方法，末了还调侃一句“但为众幼待哺者不悦耳”——把骨头里的肉渣渣都吃得一干二净，狗们当然不高兴了。

荔枝是苏东坡到惠州后才第一次品尝到的。这种据说杨贵妃十分喜爱的南方水果，苏东坡早知其名，只是在中原无法一饱口福。现在，他不但吃到了荔枝，还看到了成片的荔枝林。荔枝散发出淡淡的清香，苏东坡戴着竹笠走在林子里，大快朵颐之余，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：
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只要有荔枝可吃，就不在乎贬谪在遥远的岭南了——这或许可以看作苏东坡的自我安慰，但这种自我安慰却显示了他对生活的物质要求如此之低。**这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，因为容易满足，才有了对困境的收放自如。**

朋友们的安慰从四面八方飞向惠州。可以说，苏东坡贬惠之前，这座岭南小城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了如此众多目光的关注。佛印和尚远往江南，想给苏东坡写封信，却没人传递。另一个和尚卓契顺说：惠州又不是在天上，多走点路就到了。于是他就带着佛印写给苏东坡的信上了路，风餐露宿，依靠两条腿走到了惠州。

苏东坡的感动自不用说。更让他感动的是佛印的佛，佛印怕苏东坡想不开，引经据典地开导他，用佛家的虚无思想要他看开些，一定要大彻大悟。

其实，这时的苏东坡用不着开导，他早就看开了。虽说他不可能像出家人那样大彻大悟，但他至少可以比绝大多数人看得更开。参寥也派人送信安慰苏东坡，苏东坡给他回了封信，他的达观与看得开显而易见：

某到贬所半年，凡百粗遣，更不能细说。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，却住一个小村院子，折足铛中，糲糙米饭便吃，便过一生也得。其余瘠病人，北方何尝不病？是病皆死得人，何必瘴气？但苦无医药。京师国医手里死汉尤多。参寥闻此一笑，当不复忧我也。

在惠州，苏东坡写过一首广为人知的词，那就是《蝶恋花》：

花褪残红青杏小，燕子飞时，绿水人家绕。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？

墙里秋千墙外道，墙外行人，墙里佳人笑。笑渐不闻声渐悄，多情应被无情恼。

这首美丽又伤感的词，没想到竟成了他心愛的侍妾王朝云早逝的诱因之一。据说，朝云十分喜欢这首词。这个原本一字不识，跟随苏东坡后耳濡目染，遂有相当文学修养的女子，自从儿子夭折后就落着寡欢。秋天时，苏东坡令朝云唱这首词，朝云唱着唱着，不由泪流满面。苏东坡问其故，朝云说：奴所不能歌，是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”。不久，朝云染上瘴疫，病中，她常常情不自禁地念起这首伤感的词。

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夏天，朝云病逝，享年33岁，跟随苏东坡已经20余年。朝云死后，苏东坡把她安葬在西湖之滨。至今，她小小的坟冢仍在，坟头草树碧绿，坟旁立着一尊雕像。自从王朝云去世后，悲痛的苏东坡再也不愿去西湖，也不再听那首《蝶恋花》。

毫无疑问，苏东坡有一颗伟大的心灵，这颗心灵最大的特点是善于化解痛苦和烦恼。他深知生命的珍贵，因此不愿在无能为力之忧郁中愁眉苦脸。换言之，苏东坡是一个即便上了刑场，也要顺便看看刑场周围的乐观主义者。

然而，乐观又一次为他惹来麻烦。那是朝云死后半年多，苏东坡从悲痛中解脱出来，写了一首七言小诗：

白发萧萧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
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

不久，这首诗就传到了京师。京城里，有人阴阳地笑了：苏轼还过得这般快活吗？



搔首凄凉十年事

纵然是今天，孤悬南海的海南岛也是一个遥远的地方；而在苏东坡的宋朝，简直就是神秘恐怖的月球。

那个在京城里冷笑的人就是章惇。他不能容忍苏东坡过得“这般快活”——在小人眼里，你苏东坡已经贬谪到化外之地了，居然还“春睡美”，这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吗？所以，小人又动手了。这一次，苏东坡被贬为琼州别驾，昌化军安置。以章惇的行事风格来看，要是大宋在南极有领土，他一定要把苏东坡贬到南极才满意。

除了上路，苏东坡别无选择。命令是以陛下名义发出的，除了谢主隆恩，他又能说些什么呢？

比前往惠州时还要恹恹，这一次，苏东坡只带了儿子苏过。父子两人坐船到广州，再由陆路往雷州半岛而去。在滕州，苏东坡巧遇了贬往雷州的苏子由，兄弟俩已经有些日子没见面了，没想到却在白发如霜的晚岁相逢于遥远他乡。**非常有意思的是，以后，宋徽宗即位，章惇也遭贬谪，贬谪地就是雷州**。天道好还，可见一斑。

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记载说，苏氏兄弟在滕州一家路边小店吃饭，这种穷乡僻壤，自然没什么好东西，店家只供应一种汤饼。兄弟两人默默吃着粗劣的汤饼，子由突然放下筷子唉声叹气——想必他想起了锦衣玉食的昨天吧。苏东坡却悠然一笑，一边吃饼，一边安慰弟弟：这种汤饼，你难道还想细细品味吗？

子由陪同哥哥前往雷州半岛南端的逆角场，苏东坡将从这里坐船渡海。宋代的逆角场，在今天的徐闻县南山镇。南山镇龙头村一带，历史上是著名的港口和海盐生产基地。史书称：“雷州徐闻县逆角场，直对琼管，一帆济海，半日可到，即其所由之道也。”

渡海前夕，兄弟俩秉烛夜谈。然而，苏东坡的痔疮发作了，整夜呻吟不止，苏子由也竟夕不眠，陪伴哥哥，并劝告他以后一定要少喝酒。天明，苏东坡雇船渡海。

那一天的琼州海峡风平浪静，太阳在海面跳跃着，把海水染成一片不真实的绯红。苏东坡和儿子上了船，他站在船头，向立在岸边的子由等人告别。此时的子由已经泪流满面，苏东坡忽然笑了，他对弟弟说：孔子所说的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”不就是这样吗？

是年，苏东坡62岁（文中均为虚岁），苏子由59岁。这一次押车，既是生离，也是死别——直到苏东坡病逝，兄弟俩也没再见过面。

七月初，苏东坡抵达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。知州张中初对名满天下的大师很不错，亲自张罗为他修葺了居所，还常常请他到府中喝酒下棋。然而，好景不长。不久，章惇派人将苏东坡逐出官舍，张中也为此罢官。

苏东坡只好花尽了几乎所有积蓄买地建屋，竣工后，取名桄榔庵。桄榔是棕榈科的一种高大植物，苏东坡的新居，就位于一片辽阔的桄榔林里。以后，桄榔庵被当地人改为纪念苏东坡的东坡祠。今天的儋州，有一座东坡书院，书院里最重要的景点就是东坡祠。不过，北宋时，它并不在现在的位置，而是苏东坡去世200多年后，才从儋州城南的桄榔庵迁建到这里的。

苏东坡时代，孤悬海外的海南岛，生存境况无比艰难。苏东坡自陈：此间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衣，然亦未易悉数，大率皆无耳。写给子由的诗中，苏东坡说儋州生活极差，难得吃肉，当地人以蕲鼠和烧蝙蝠作菜。他感叹过只要一听到蝙蝠都要作呕，现在却不得不要把它作菜了，过去在京城里天天以肥羊下白米饭都觉得食之无味，现在无食可吃，简直就是活该。

海南岛的食粮要靠船只从大陆运来，遇上风浪，岛上往往缺粮。这种尴尬对苏东坡来说已成家常便饭。元符元年（1098年）冬天，他和儿子在缺少食粮的窘境下，已经“相对如两苦行僧尔”。最困难时，他甚至异想天开地研究用食阳光止饿的办法。海南人几乎天天骄阳如火，可惜这遍地阳光却是没法止饿的。孤零零的日头下，清瘦的大师如同一株风中的修竹，他被命运流放到了天涯之涯海的角隅的孤岛。他无法突围。

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，无论外在条件如何艰难，也难以改变他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茫茫世事。清贫如洗的日子，他继续寻找快乐。

十多年前，我为苏东坡写过一部小书。小书里，我曾经说：尽管很不情愿，也不得不承认，苏东坡身上有着淡淡的，却是纵贯了一生的阿Q精神。假设我们判定阿Q精神拯救了苏东坡，请相信，这并不是危言耸听。我们甚至可以断言，如果不是阿Q精神，苏东坡也许早已在无尽的流放中郁郁而终。只有当这位可爱的老家伙即便流放烟瘴岭南时仍然自我安慰、自寻其乐时，我们才有理由相信海明威的《老人与海》所揭示的主题：人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被打败的。

年轻时，我曾经感到迷茫的一个问题是：既然凡·高一生都过得那样悲惨，那样不堪回首，为什么欧文·斯通会将这位疯子天才的传记命名为《渴望生活》？一个人难道会在如此这般的逆境里反而更加热爱更加渴望生活吗？苏东坡当然与凡·高不同，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却完全一样。（下转 12版）